發現三星堆

三發塊地

段渝 著

引 言 / 1



第一章 三星堆: 文明的重現 / 001

一、探索與期待 / 003

二、文明的曙光 / 011



第二章 三星堆:神權政體與文明 / 019

一、文明的創造 / 023

二、神權政體的物化表現 / 027

三、神權的功能 / 042

四、古蜀的象牙祭祀 / 055



第三章 三星堆:神權政體的運作系統 / 067

一、分層社會的複雜結構 / 069

二、基本資源的佔有模式 / 075

三、再分配系統的運作機制 / 082

四、統治集團的分級制體系 / 090

五、從三星堆文化看古代文明的本質特徵 / 099



第四章 三星堆與金沙:古蜀城市文明 / 103

- 一、三星堆古城的發現與確認 / 108
- 二、三星堆古城的形成 / 118
- 三、三星堆古城的功能、結構與佈局 / 121

四、十二橋文化與金沙遺址:成都城市的形成 / 123

五、成都城市的功能、結構與佈局 / 133

六、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中外比較 / 138



第五章 三星堆:古蜀文明與夏商文明和長江中游文明 / 153

- 一、三星堆與夏文化 / 155
- 二、三星堆與商文明 / 168

三、三星堆與盤龍城 / 192



第六章 三星堆: 商代中國黃金製品的南北系統 / 203

- 一、商代黃金製品的北方諸系統 / 206
- 二、三星堆:商代黃金製品的南方系統 / 217
- 三、南北系統的技術異同 / 230

四、南北系統的功能差異 / 234

五、金杖與九鼎 / 237



第七章 三星堆:古蜀文明與歐亞古文明 / 243

- 一、金杖探源 / 245
- 二、雕像探源 / 253
- 三、古蜀藝術形式與近東古文明 / 264

四、古蜀文明與東南亞文明 / 285



第八章 南方絲綢之路:古代中印交通與中國絲綢西傳 / 297

- 一、三星堆:蜀錦和蜀繡 / 302
- 二、海貝之路 / 307
- 三、象牙的來源 / 312

四、Cina:成都與絲綢之路 / 316

五、Seres:賽里斯與絲綢之路 / 327

六、成都:絲綢之路樞紐 / 334

引言

1986年夏秋之交,從四川廣漢傳出了轟動中外的重大考古新發現: 在廣漢三星堆遺址,連續發現兩個祭祀坑,坑內出土上千件青銅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大量海貝,包括青銅大立人像、大量青銅人頭像、人面像、青銅神樹、獸面像、金杖、覆蓋黃金面罩的青銅人頭像等稀世珍寶^①,引起世人震驚。這個重大考古新發現,一下子徹底顛覆了人們



三星堆一號祭祀坑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

①《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第10期;《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5期。又,現已證實,三星堆並非南城牆,南城牆尚在三星堆之南。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

對古史記載中僻處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國的認知, 使人們第一次認識到,商代的古蜀王國,原來是 一個擁有燦爛青銅文化的文明古國!從此,人們 對巴蜀文化刮目相看,而三星堆則以它輝煌燦爛 的青铜文明享譽世界文明史,正可謂:「沉睡數 千年,一醒驚天下!」

2019年,四川省啟動了「古蜀文明保護傳承 三年行動計劃1,開始了對舉世聞名的三星堆遺 址的新一輪考古發掘。在隨後的兩年時間裡,考 古工作者在1986年發掘的一、二號祭祀坑旁, 相繼發現六個祭祀坑,依次編號為三至八號坑。 2021年3月,中央電視台連續三天對三星堆新發 現的六個祭祀坑的發掘現場淮行了直播,引起 轟動。5月,四川衛視聯合中央電視台又對發掘 現場進行了連續兩天的直播,再次引起轟動。 三星堆新一輪的考古發掘, 如拔地而起的旋風, 迅速席捲了中外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廣播電視、 互聯網、手機、微信、微博、報紙等各種現代傳



三星堆出土的戴黃金面罩的青銅人頭像



三星堆出土的黃金面罩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頂尊跪坐人像出土情況

三星堆三號祭祀坑青銅大口方尊出土情況

播媒體上,幾乎是無處不見三星堆。截至 2021 年 5 月,在新發現的六個 坑內,已提取出土青銅器、象牙、玉器、金器等 524 件,其他文物殘片 2000 件,並首次發現絲蛋白和絲綢殘留物,還有大量文物有待一一提 取出土,將會有更多更大的驚喜重見天日。正可謂:時隔卅五年,再醒 驚天下!

第一章

三星堆: 文明的重現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研究,是從廣漢真武宮玉石器坑的發現和成 都白馬寺壇君廟青銅器的發現與研究開始的。

一、探索與期待

1929年(一說 1931年春),四川廣漢縣(今廣漢市)城西十八里太平場附近真武宮南側燕氏宅旁發現大量玉石器,其中不少種類在形制上與傳世和其他地區出土的同類器型不同,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



1929 年燕道誠與家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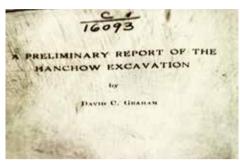


葛維漢、林名均在廣漢考古發掘時留影

1930年,英籍牧師董宜篤(A. H. Donnithone) 函約成都華西大學教授 戴謙和(D. S. Dye) 同往調查,獲得一批玉器。戴氏據此撰《四川古代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備記其事,並對器物用途等略加探討。該文發表於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學會主辦的英文雜誌《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第4卷(1934年)。1932年秋,成都金石名家龔熙台稱從燕氏購得玉器4件,撰《古玉考》一文①,認為燕宅旁發現的玉器坑為蜀望帝葬所。1934年,華西大學博物館葛維漢(D. C. Graham)教授及該館助理館員林名均應廣漢縣政府之邀,在燕宅旁正式開展田野考古發掘,頗有收穫,由此揭開了日後三星堆文化發掘與研究的序幕。

1934年7月9日,時旅居日本並潛心研究甲骨文的郭沫若在給林 名均的回信中,表達了他對廣漢發掘所取成果的興奮心情,並認為廣 漢出土玉器與華北、華中的發現相似,證明古代西蜀曾與華中、華北 有過文化接觸。他還進一步從商代甲骨文中的蜀,以及蜀曾參與周人

① 龔熙台:《古玉考》,《成都東方美術專科學校校刊》創刊號, 19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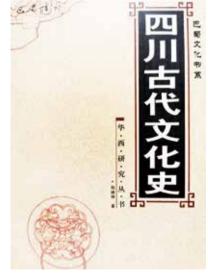
葛維漢論文

林名均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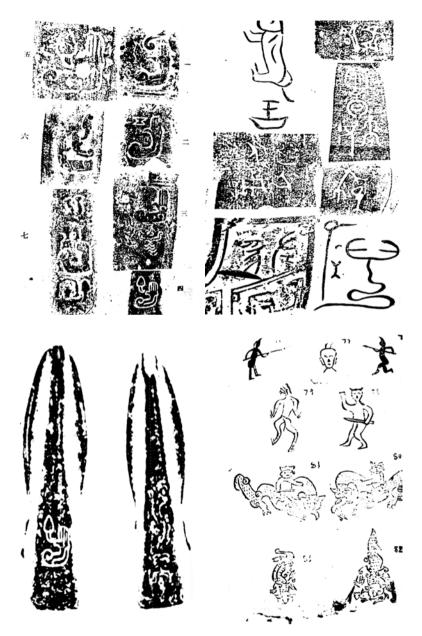
克商等史料出發,認為廣漢遺址的時代大約在西周初期。

1936年,葛維漢將廣漢發掘及初步研究成果撰成《漢州發掘初步報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發表於《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第6卷(1936年)。林名均亦撰成《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一文,發表於《說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兩文均認為出土玉石器的土坑為墓葬。至於年代,葛維漢認為其最晚年代為西周初年,約當公元前1100年;林名均則將廣漢文化分為兩期,認為文化遺址的年代為新石器時代末期,在殷周以前,坑中所出玉石器則為周代遺物。

1946年7月,華西大學博物館出版了鄭德坤教授的《四川古代文化史》,把「廣漢文化」作為一個專章加以討論研究,不同意葛維漢、林名均提出的墓葬之説,認為廣漢出土玉石器的土坑應為晚周祭山埋玉遺址,其年代約為公元前700—公元前500年;廣漢文化層為四川新石器時代末期遺址,在土坑時代之前,其年代約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700年之間。



《四川古代文化史》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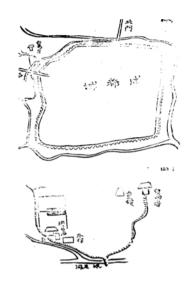


白馬寺壇君廟發現的青銅器紋飾

廣漢發掘尤其「廣漢文化」的提出, 表明當時的學者對廣漢遺物與中原文化 有異有同的現象開始給予了關注。不過, 由於種種原因,廣漢文化在當時並沒有 引起更多學者的特別重視。

20世紀 40 年代,學術界發生了一場 綿延至今的論爭,引出了對這個謎一樣 的古蜀王國面目的逐步揭示。

自 1920 年代開始,在成都西門白馬 寺壇君廟,不時發現青銅器,以兵器為 多,形制和花紋與人們常見的中原青銅 器有異,流散到各地以至海外,被一些



衛聚賢所繪成都白馬寺壇君廟位置圖

收藏家所藏,稱引為「夏器」。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學者雲集四川, 見到這批造型奇特的青銅器,產生了很大興趣,於是開始了對它們的 來源、系屬甚至真偽的專門研究。



《說文月刊》書影



《說文月刊》「巴蜀文化專號」目錄頁



郭沫若與衛聚賢

當時的學者衛聚賢詳細搜集資料,寫成兩篇考釋論文,均題為《巴蜀文化》,先後發表在具有很大影響力的《説文月刊》上。經過初步研究,衛聚賢認為,這批青銅器是古代巴蜀的器物,年代可以早到商代^①。



《論巴蜀與中原的關係》書影

衛聚賢的文章刊佈後,在學術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知名學者力駁衛説,認為衛文所舉青銅器,不是中原兵器,便是偽器。如金石甲骨學家商承祚、考古學家鄭德坤等,都不同意衛聚賢的看法。在當時四川尚未開展科學的考古工作的情況下,人們大多還是信奉古人言:「蜀無姓」「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當然也便會否定巴蜀青銅器以至巴蜀文化的存在了。

可是,由「巴蜀文化」所引起的 學術論爭,並沒有因此而沉寂下去。

① 衛聚賢:《巴蜀文化》,《說文月刊》第3卷第4期,1940年;第7期,1942年。

1941年,古史辨派大師顧頡剛經過仔細搜集古史,以其雄才大略寫成並發表了重要論文——《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徹底否定幾千年來人們信奉不二的「巴蜀出於黃帝説」,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獨立發展説」,認為古代蜀國融合中原文化乃是戰國以來的事^①。這篇論文,實際上提出了中華文明多元起源,以及古蜀文明起源等重大問題,只是限於當時條件,未將這個重大課題再行具體化。



巴蜀文字符號

①顧頡剛:《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中國文化研究彙刊》1941年9月1卷。

巴蜀古史的討論激發了一大批著名學者的熱情,他們紛紛著文參加討論,各抒己見。甲骨學家們也滿懷激情地參加到撥開古蜀王國歷史迷霧的研究行列中來。郭沫若根據甲骨文上的「蜀」字,斷定蜀「乃殷西北之敵」^①。陳夢家認為甲骨文中的「蜀」,是西南之國^②。董作賓不僅斷言甲骨文中的「蜀」約當今之陝南或四川境,而且進一步根據甲骨文所載商、蜀關係,指出蜀為商王朝西南的大國^③。

與此同時或前後,還有一批學者對古蜀王國的歷史、傳說、交通 以及物質文化進行了探討,獲得了可喜的成果。

然而,上世紀 40 年代的論爭,大多建立在文獻考訂的基礎上,由於 年湮代遠,文獻難徵,又缺乏科學的考古材料的支持和驗證,所以往往只 能提出問題,還談不上對古蜀王國歷史的復原,更談不上給以科學的解釋。

1950年代後,科學的考古事業飛速發展,一批又一批古蜀文化遺存、遺跡和遺物不斷重見天日,為重新探索古蜀王國之謎提供了契機。



馮漢驥在考古現場

① 郭沫若:《卜辭通纂》,科學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9 頁。

② 陳夢家:《殷代地理小記》,《禹貢》第6、7卷合刊,1937年。

③ 董作賓:《殷代的羌與蜀》,《說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

徐中舒率先在《巴蜀文化初論》中指出,古代四川是一個獨立的經濟、文化區,與中原既有經濟聯繫,又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不過語言文字和社會組織與中原並不相同①。蒙文通詳細研究了史料,認為古蜀原來是一個小國,發祥於岷山一帶,後來下遷至成都平原,經過治水,農業發達,形成了燦爛的文化②。

在這一時期,由於新繁水觀音遺址和墓葬、廣漢中興遺址、成都 周圍的遺址和墓葬以及彭州竹瓦街青銅器窖藏等的發現,使學術界認 識到,古蜀國的物質文化可以確切地追溯到殷周時期^③。馮漢驥還根據 古蜀的各種物質文化遺存,認為古蜀大約在殷周之際即已進入階級社 會,考古學上的巴蜀文化,僅是一種青銅時期的文化^④。

到了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對於古蜀王國的歷史,可以說已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考古材料和文獻資料,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廓清了前人的許多疑問,對於春秋戰國的古蜀史有了比較明確的看法,尤其對古蜀青銅器的研究有了長足進展,對於巴蜀文字的研究也進入了新的認識階段。到這個時候,幾乎再也沒有人懷疑古蜀王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再也沒有人懷疑古蜀王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夏商時代了。

然而,這個歷史如此悠久的古蜀王國,它的政體、性質、王權結構、統治範圍、規模、文明程度究竟是怎樣的,卻一直困擾着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學術界在探索中期待,在期待中探索,人們堅信,古蜀文明的曙光就要從地面下重新照射出來!

二、文明的曙光

經過考古工作者多年的辛勤發掘,三星堆古蜀文化遺址終於透出了 3000 多年以前古代文明的光芒。

① 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論》,《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59 年第 2 期。

② 蒙文通:《巴蜀史的問題》,《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59 年第 5 期。

③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收穫》,文物出版社 1961 年版,第72—74 頁。

④ 馮漢驥:《西南古奴隸王國》、《歷史知識》1980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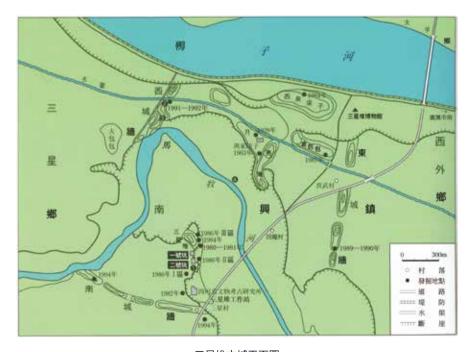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

廣漢三星堆遺址發現於 1929 年(一説 1931 年)。1934 年,華西大學葛維漢、林名均等首次在三星堆進行了考古發掘。1963 年,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聯合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發掘。1980 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隊在三星堆試掘和發掘,獲得了豐富的考古資料:發現房屋遺跡 18 座、灰坑 3 個、墓葬 4 座、玉石器 110 多件、陶器 70 多件及 10 萬多件陶片。繼而,1982 年在三星堆南側進行發掘,發現了窯址。1984 年,在三星堆北面的真武宮西泉坎進行發掘,出土了大量陶、石器,發現了大量石壁成品、半成品和廢料以及房屋基礎。1986 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聯合進行發掘,出土陶器、雕花漆器等器物 2000 餘件、灰坑 109 個、房址數十處。同年夏秋之際,還發現了舉世聞名的一號、二號祭祀坑 ①。此後,在廣漢三星堆遺址還開展了多次發掘,有 1988—1989 年東城牆的發掘,1991—

①《廣漢三星堆遺址》,《考古學報》1987年第2期;《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第10期;《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5期;陳顯丹:《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概況、初步分期一兼論「早蜀文化」的特徵及其發展》,《南方民族考古》第2輯,1990年。



留存至今的三星堆古城遺址



三星堆古城平面圖

1992 年西城牆的發掘,1995 年南城牆的發掘,1997 年 11 月—1998 年 5 月仁勝村土坑墓的發掘等 ① 。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後的幾次系統調查還表明,三星堆遺址是由 6 個大的遺址區域組成的大型遺址群,總面積達 12 平方公里。在三星堆遺址的東、西、南部,發現了巨大的城牆,東城牆長 1800 多米,西城牆 800 多米,南城牆 長約 210 多米。調查和勘測結果表明,三星堆古城東西長 1600 至 2100 米,南北寬 1400 米,現有總面積 3.6 平方公里。城牆的始築年代,約當中原的早商時期,為三星堆遺址第二期^②。

在三星堆遺址周圍的廣漢、什邡、彭州、新都等地區,還調查到 十餘個相當於三星堆上層文化的古遺址,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廣漢金魚 鄉石佛寺遺址、興隆鄉煙堆子遺址、什邡市人民 —— 新安遺址等^③。

巨大的城牆、高貴的宮殿區、盛大的祭祀區、密集的生活區、居 住區、作坊和眾多的文化遺跡、大批珍貴文物,以及周圍遺址的分佈 形態,初步顯示出三星堆遺址的重要意義,閃耀出早期文明的曙光。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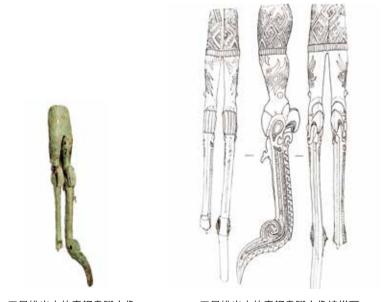
① 陳德安:《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研究》,《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2期。

② 陳德安、羅亞平:《蜀國早期都城初露端倪》,《中國文物報》1989年9月15日。

③ 陳德安:《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研究》,《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2期。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縱目人面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鳥腳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鳥腳人像線描圖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喇叭座頂尊人物像



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鳥身人面像

這一切,把令人驚異而陌生的古蜀文明和古蜀王國重新展現在人們 眼前。

1986年夏秋之交,更為令人驚異並且轟動中外的重大考古新發現 又傳出來:在三星堆潰址連續發現兩個祭祀坑,其中發現上千件青銅 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大量海貝①。這一重大考古發現、徹底改 變了人們對古蜀王國的認識,使人們第一次認識到商代的古蜀王國, 原來是一個擁有燦爛青銅文化的文明古國!

多年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已經把古蜀王國的一些基本結構揭 示出來了,從而大大彌補了古代文獻不足徵的缺陷,為學術界研究、揭 開古蜀王國之謎提供了一把鑰匙。古蜀王國, 這個 3000 多年前的神秘 王國的大門,就要向我們敞開了。

三星堆文明的內涵之豐富、文物之輝煌、特色之鮮明,顯示出它 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發展中特色獨具的重要一元,是中華文明 的組成部分之一,是長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三星堆文化是在成都平原高度發展的新石器文化的基礎上,主要 吸收並凝聚了中原、西北和長江流域文明的文化精華,並兼收並蓄了 世界文明的某些因素, 從而發展形成的一種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

①《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第10期;《廣漢三星 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5期。

第二章

三星堆:神權政體與文明



距今三四千年前,在今廣漢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寶墩文化)的廢墟上,高高聳立起堅固而厚實的城牆,城牆外掘有深深的壕溝。南城牆內的兩個祭祀坑內,埋藏着數以千計、舉世罕見的大型青銅製品、黃金製品、玉石製品、象牙和海貝。方圓達 3.5 平方公里的城圈內,分佈着密集的文化遺存,有宮殿區、宗教區、生活區和作坊區,出土大批玉石禮器、陶製容器、陶塑工藝品和雕花漆木器。在一些陶器表面,還赫然醒目地刻畫着一些文字符號。這一切,都確鑿無疑地表明,在廣漢三星堆遺址,城市、文字(符號)、青銅器、大型禮儀中心等多個文明要素不僅



新津寶墩古城牆遺址的西城牆





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出土器物情況

都已同時、集中地出現,而且還發展進化到相當高的程度,它顯然標誌 着古蜀文明時代已經來臨。相應地,城鄉分化、階級分化、社會分層、 權力集中,也已發展到新的歷史階段,一個植根於社會而又凌駕於社會 之上的古蜀王國已經形成。這一切都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一個燦爛的古 代文明中心,已經誕生在古蜀深厚而廣闊的大地上。



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的虎形金箔飾



三星堆出土的海貝